

# 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因素

陳文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一、前言

柯林頓當選為美國第四十三任總統以來，已有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對柯林頓政府外交政策可能走向的一些看法。有些學者認為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當有異於共和黨，也有些認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理想主義的目標與色彩會較為明顯，這些看法，大體上是基於政黨及總統個人理念與決策風格的不同而言。<sup>①</sup>

研究美國的外交政策，固然可以從總統個人決策風格與政治理念來探討，總統任命的內閣部長，特別是國務卿、國防部長及國家安全顧問等也可能反映總統的施政理念。白宮與國會的關係、輿論、大眾傳播、社會各層面的領導人物等，亦均為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國內因素。

此外，也可以從不同的學術領域來探討研究美國外交政策。例如，解釋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因可從政治心理學、社會學等不同學術角度加以研析。也就是說：「你站立的位置端看你所坐的位置而定」(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

就政治社會學的觀點，政治理念與行為是一種社會化的學習過程。據此，一個國家國民的世界觀，與世局及該國處此世界的地位及該國的政治文化息息相關，例如，威爾遜總統主張的「十四點和平計畫」反映出美國的法制主義，而晚近卡特政府標榜的人權外交也反映美國政治與文化的傳統。

本文則從影響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外交政策至鉅的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 or Realpolitik)來回顧美國於冷戰時代的外交政策，也希望經由此項嘗試，能讓我們對美國外交政策於後冷戰時代的變與不變之處能有一較清楚的觀察

註①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請參見美國月刊，第八卷第一、二期，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及二月。

基礎。

大抵上，探討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因素有下列幾點原因：一是美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學術界與外交界的主要領導人物多是秉持現實主義，如知名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肯楠(George F. Kennan)、季辛吉等，他們的著作豐富，理論見解都深深地影響到美國外交的理論與現實。二是現實主義之能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外交有它的冷戰時代的背景，但現實主義的主張經常超越了決策者的政治理念及政黨理念，特別是在國家利益遭遇挑戰時。因此在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現實主義提供了一個連貫性的基礎。三是不分總統的黨派背景及政治理念與決策風格的不同，政治現實主義提供了他們觀察現實的國際局勢的觀點與外交行動的理論基礎。民主黨總統卡特的人權外交，曾一度激發美國學界就道德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所應扮演角色的辯論，卡特就任不久後即曾發表演說，認為不必對共產主義過度的擔心，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侵入阿富汗，卡特却認為是冷戰以來對美國最嚴重的戰略挑釁。卡特政府的應變措施，例如：對蘇聯的穀類禁運及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等，又十足地說明了以現實主義觀點為基礎的外交行動。這一類政策、見解的轉變，都為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提供了事實的佐證。

## 二、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

摩根索在他所著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即開宗明義地為政治現實主義做了六項基本原則的闡述，他認為，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理論的貢獻莫過於現實主義提供了一個用「權力」(power)界定的「利益」(interest)的觀念，摩根索認為如果沒有這項觀念，則國際政治理論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無法區分政治與非政治的事實。<sup>②</sup>

而「權力」就是現實主義所最關心的手段與目的，因為舉凡國際的安定，世界的和平與國力的增強均與國際間權力之消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就如同摩根索所言，對一項政策，現實主義者會問，這項政策會如何影響到國家的權力，而道德學家會問這項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原則。但據摩根索之看法，現實主義並非完全忽略了道德，而是現實主義者考慮的是政治行動的道德意義，不能為了道德原則而犧牲了多數人的利益或國家的利益。<sup>③</sup>

摩根索對道德在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地位與十六世紀初義大利政治外交家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理論有異

註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pp. 3~15.

註③ *Ibid.*

曲同工之妙。馬基維利在他的論著《君王論》(The Prince)中即強調國家生存的重要性應超越任何道德的規範，國家爲了生存而採取的任何行動都有它的合法性及道德適當性，易言之，對馬基維利而言，國家就是最高道德的化身。<sup>④</sup> 現實主義者認爲：

(一)基本上國際政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沒有一超國家的組織或政府可以規範或約束國家的行爲，也沒有此一超國家組織或政府擁有武力可以制裁或懲罰國家。也因此，自保成爲任何國家最高的目的，這種近似自然狀態的國際政治觀，似可追溯到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所著《利維坦》(Leviathan)一書內的有關論點。霍布斯認爲人類的「自然狀態」是一種強凌弱、衆暴寡及人人爲敵與人人爲戰的無政府狀態。對霍布斯可言，國家間的「自然狀態」亦復如是，沒有高於國家的權力可以約束一個國家的野心的狀況下，國家間就一直處於爭戰的狀態，而在此一環境下，就沒有對或錯的觀念可言，因爲霍布斯認爲，「在沒有一公權力的地方，就沒有法可言，沒有法的地方，就沒有不公正」(Where there is no Common Power, there is no Law; where no Law, no Injustice)。<sup>⑤</sup>

(二)現實主義者視國家爲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成員，因爲國家具有至高無上及不可侵犯的主權，這項主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國家用以追求國家利益及確保國際政治中的生存地位，由於國家擁有主權，因此不是非政府性的組織如跨國公司所可比擬。雖然不同的政府性或非政府性組織各於不同的領域對國際關係發揮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一有國際衝突及紛爭時，則這些組織就無法發揮如國家可訴諸武力解決的作用，也因此「權力」是國家在國際政治上最需要具備的，國家靠權力來維持它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政治中的安全與生存。如摩根索所言，國際政治是一項權力的鬥爭，國家爭取權力並藉由國際政治來達成國家所設定的目標。<sup>⑥</sup>

(三)國家爲了生存，必須有一實用、謹慎且具彈性的外交政策，不能讓單一國家過於強大，因爲一個國家太強大將威脅到其鄰國的安全，若如此，則必挑起軍備競賽，因此，現實主義者認爲維持國際的安定與和平的不二法門就是「權力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sup>⑦</sup>但現實主義者並不認爲國家可完全避免戰爭，國家透過高度技巧的外交，則可望減低國際衝突

。現實主義者小心翼翼地解釋道德在現實主義理論內的適用性，或許上述的理由也正說明了爲什麼卡特總統於蘇聯侵入阿

註④ 引於 Michael Joseph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0~11.

註⑤ *Ibid.*, p. 13.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有關國家對權力平衡的運用，參見 John Spanier, *Games Nations Play*, 6th ed.,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7), pp. 123~125.

富汗後，要求參議院暫緩批准「限制戰略核子武器談判」條約。該條約關係到美國與蘇聯因核武競賽所引發的內政與國際危機，兩國龐大的核子武器更威脅到人類的存亡，對卡特總統而言，這項條約具有相當高的道德價值，但他對蘇聯入侵阿富汗此一行爲的失望，則不得不重新審視美國在當時國際局勢內應有的應對措施。

綜觀上述，基於國際間弱國易遭侵侮，而強國可成帝國的歷史爭戰事實，而形成講求權術的國際政治觀點，在美俄對抗的冷戰時代，對主張現實主義的美國外交策者而言，現實主義不能不說沒有強化危機意識的作用。但是現實主義取向的美國外交政策則經常被理想主義者批評爲不道德，理想主義者認爲道德是賦予外交政策的一項原動力。兩種主義若僅停留在政策制定時的論辯，或對國家社會無直接的影響，一旦付諸執行，則主張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亦有必須付出慘重代價的時候。美國已故參議員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即曾言，美國參與韓戰、越戰等這種過激且想像力豐富的現實主義，實非美國之福。<sup>⑧</sup>

### 三、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因素

#### (一) 冷戰時代

美國的外交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有極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人員的傷亡與財產的損失之慘烈，史無前例，美國寄望以強國包括英國、法國及蘇聯爲主導的聯合國來維持戰後的國際秩序，並期待國際間的衝突可以經由和平的方法加以解決。這種情況很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亦很期待國際間的衝突可經由國際聯盟加以妥善處理，而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簽訂的凡爾賽和約便是基於對民族自決原則及對建立民主政治的強調之上，此二個例子充分反映了經由慘烈的戰爭之後，美國政府與人民擔心戰事再起的普遍厭戰心理，因此也提供了理想主義思潮興起的國內與國際環境。然而，及至史達林擬將東歐劃入蘇聯勢力範圍的野心漸顯，及至希臘、土耳其有受赤化的危機，美國杜魯門政府才斷然地對蘇聯採取強硬措施。一反雅爾達協定後，美國羅斯福政府對蘇聯於戰後參與維持世界和平的殷切期望。

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對國會參、衆兩院的演說中指出，極權政權及其對內的鎮壓與對外的侵略均危及世界和平與美國的安全，至此，美國開始軍、經援助共黨作亂中的希臘與土耳其，而此一反共的「杜魯門主義」也就成爲第二

<sup>⑧</sup> J. William Fulbright, "Reflections in Thrill to Fear," in Frederick H. Hartmann, ed., *World in Crisis*, 4th e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3), p. 313.

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外交的最高指導原則。

美國的資深外交家喬治肯楠以署名為「X」於一九四七年七月發表於外交事務季刊 (*Foreign Affairs*) 中的文章，主張美國應洞悉蘇聯權力的本質，他認為蘇聯基於共產主義認為西方國家都與它為敵，蘇聯責無旁貸的責任即是推翻西方國家這股資本主義的政治勢力，肯楠認為美國的對蘇政策將必須是一種「長程而有耐力且兼具強硬及警覺性的圍堵政策」，圍堵政策因而扮演著杜魯門主義為美蘇冷戰的時代正式揭開序幕。

二次戰後的國際權力架構的變化也與戰前有了顯著的不同，根據國際政治理論學者瓦爾茲 (Kenneth Waltz)，「架構」(Structure) 就是「權力分配的型態」，而「安定」(Stability) 是指「使此一架構深邃化但却沒有引起破壞性或毀滅性的暴力。」<sup>⑨</sup>基本上，冷戰時代雖有因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使美、蘇兩國瀕臨核戰危機外，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也儘管有多次的所謂「代理人的戰爭」，美蘇兩國於二次戰後近半世紀來並未有過直接的軍事衝突，因此，我們也可認為冷戰時代的國際權力架構，基本上是種緊繃的安定。

研討冷戰時代由現實主義主導的美國外交政策，除了上述的戰後國際情勢的變化外，我們也應探討限制美國外交政策的國際體系的因素。

冷戰時代的國際權力架構，基本上是由美蘇兩超級強國主導的對抗時代。由於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即已對蘇聯於戰後在國際政治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史達林對美國的用意表面上也報以積極的回應，例如蘇聯同意讓東歐國家於戰後辦理自由選舉與組織自治政府，並承諾對日戰爭，已隱然種下美蘇於戰後主導世局的遠因。但是由於蘇聯於戰後，拒從伊朗撤軍並圖使土耳其變為它的附庸國。蘇聯為攫取戰爭勝利的果實並擴充它的勢力範圍，積極支持東歐國家內及希臘的共產主義運動，及至「杜魯門主義」及「圍堵政策」之興起及東歐國家成為蘇聯附庸國，壁壘分明的兩極國際體系於焉形成。

2. 維持冷戰時代國際權力體系安定的一項主因是權力平衡。兩極國際體系下，兩強競爭的本質是種一方有所獲即被視為對方之失的「零和遊戲」(the zero-sum game)，因此美蘇兩國一方面在世界各地競爭，一方面又謹慎的避免正面衝突，美蘇對抗的態勢相當明顯。

戰後，美國對西歐的安全從經濟、政治與軍事多方面提供協助。經濟方面，美國發起馬歇爾計畫，貸款西歐各國，重建受戰爭破壞殆盡的經濟與社會，政治方面則提倡自由選舉，建立民主政治，軍事方面，於一九四九年四月發起由十二國簽訂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共同市場的成立，雖然使美國在對歐貿易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為使西歐發揮一體的力量，美

註⑨ 原文請參見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National Force,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 Hartman, ed., *World in Crisis*, p. 273.



國仍舊予以支持。

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則於一九五五年成立，固然有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抗衡的用意，蘇聯並以華沙公約組織控制其附庸並做為與西方談判的籌碼，蘇聯分別於一九五六年出兵波蘭與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出兵捷克粉碎各該國的自由運動。

在亞洲方面，中國大陸的淪陷，迫使美國加強與亞洲太平洋邊緣國家的互相防禦協定，以形成對中國大陸共黨政權的圍堵，但是美國日後介入韓戰與越戰，耗損美國國力至鉅，美國國內更形成反戰風潮，尼克森政府「越戰越南化」的政策却以越南赤化而終，雖然中南半島並沒有應驗「骨牌理論」而全落入共黨勢力範圍，但却象徵了美國圍堵政策在亞洲的決堤。

總之，雙邊與多邊同盟的建立成為美國於冷戰時代外交政策上的運用。

3. 美蘇兩國擁有龐大的核子武器也是兩國於冷戰時代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的主因之一。兩極的國際體系由於缺乏第三國的平衡，變成一種很僵硬的體系，美蘇兩國俱處於擔心對方的實力超越自己的緊張狀態，也因此兩極國際體系的政治被認為是對抗的政治，其不安定的狀態也居各種不同的國際體系之首。<sup>⑩</sup>

核子武力在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核子戰略一直是美國軍事戰略中最重要的環節，從「相互確定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核戰教條到「彈性回應」(Flexible Response)隱含核戰的可行性，到為降低核戰機會及避免無止境的核子武力競賽，而舉行的第一次與第二次的「限制核子武器談判」，也反映出美國軍事策略的演變及美蘇兩強在冷戰時代的互動關係。

雷根總統視蘇聯為「惡魔帝國」(the Evil Empire)，欲使共產主義成為歷史的灰燼，但是蘇聯却有足以摧毀世界的核子武器，一旦美蘇衝突而發動核戰，必定兩敗俱傷，因此互相毀滅的核子戰爭，似乎不是一個最佳的戰略選擇，同時也使美國人民在核戰的情況下毫無保護，雷根政府的「星戰計畫」或許反映出美國想突破此一核子對抗的僵局，而雷根或認為發展核子防衛系統可增加美國的核子嚇阻力量，同時亦可逼蘇聯談判減少核子武器，可謂一舉數得。

在冷戰時代，牽動世局的重大國際事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俄共關係的惡化。也因中俄共交惡提供了美國現實主義的外交在權力平衡運用上一個新的機會與局面。

美蘇兩極的國際體系，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有開始鬆動的跡象。中、俄共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開始交惡，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成功，正式加入了核武的行列。中共並與蘇聯爭取第三世界共黨運動的領導權，而中俄共的交惡導致一

⑩ Spanier, *Games Nations Play*, pp. 141-150.

九六九年的珍寶島中俄邊界衝突。兩權平衡的權力體系遂產生微妙的變化，美國、蘇聯與中共的所謂「戰略三角」關係於焉形成。

從戰略角度看，中俄共的分裂也被視為是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事件。①蘇聯傾向支持印度以制衡中共，印度雖標榜不結盟，但礙於政治現實而於中（共）印、印巴衝突後與蘇聯的關係更趨密切。中共除了拉攏巴基斯坦以為奧援，更批判蘇聯的東歐政策，責其出兵鎮壓捷克。同時中共也批評日本及歐洲共同市場與蘇聯的經濟合作太過密切。

美國為制衡蘇聯共黨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擴張，利用中俄共的交惡而有打所謂「中國牌」的外交策略的運用，同時越戰末期，中共取代蘇聯成為北越武器與物資的最大供應國，中共因此成為急欲結束越戰的美國所必須尋求支持的對象。而這些外交策略的初步實現，則有賴尼克森及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打開「中國之門」。

中俄共關係的惡化，使得蘇聯較願與西德改善關係，也因此使西德布蘭德政府的東進政策更為可行，同時也迫使蘇聯與美國進行限制核子武器談判，而美蘇兩國關係也漸由冷戰進入和解（*Détente*）時期，雖然兩強在世界各地的競爭並沒有急速減緩，但是美俄兩國對於和平共存有益於本身利益的認識似乎有了進一步的共識。

## （二）後冷戰時代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蘇聯國內的政經困難，使得蘇聯對介入國際重大事務的意願與能發揮的影響力已大不如昔，而一九〇年中伊拉克人侵科威特的事件，則讓美國有獲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合作的機會，而促成美國得以領兵波斯灣，解圍科威特。波斯灣危機也促成布希總統提出「新世界秩序」的觀念，旨在強調侵略行動之不容於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社會，布希且預期「一個免於被恐懼威脅而更勇於追求和平與安全時代的可能誕生。」②

以美國為主力的聯合國部隊雖贏得了波斯灣戰爭，但是有關美國如何扮演其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上的角色，及美國如何界定及塑造新世界秩序也引發一連串的討論，美國深知已不可能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類似波斯灣危機此種攸關中東和平與美國國家利益的事件，又讓美國不得不肩負起這個責任，據此，以現實主義主導的美國外交政策是否能就上述諸問題提供一個周延的理論基礎？而用現實主義的觀點來檢視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又是否允當？欲釐清這些問題，則有待對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所呈現的幾項特點加以說明：

1. 美蘇兩強對抗的國際均勢架構，已不復存在，二次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反共，亦喪失其為美國外交政策主軸的

註①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395-413.

註② 引於 Christopher Coker, "Brita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68 (1992), p. 409.

價值，而於冷戰時代用來抗衡蘇聯的雙邊與多邊的同盟關係則頓失一權力平衡的對象。至於如何讓這些同盟關係用於區域和平的維護上，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2. 聯合國維持區域和平的任務，在後冷戰時代有加強的趨勢。由於美國的主導並成功地解決了波斯灣危機，遂使得國際間以聯合國部隊來解決區域衝突及維持區域和平的期望昇高。前南斯拉夫境內的民族衝突，特別是波士尼亞——黑塞哥維納共和國內塞爾維亞人與回教徒的爭戰尤為慘烈，聯合國雖已介入調停，但仍有待美國及西歐的更積極的支持。冷戰時代所呈現的強制性的安定局面於後冷戰時代已不復可見，因此，諸如柬埔寨、南非、莫三鼻克及薩爾瓦多等國的內戰、種族衝突，對聯合國不啻是一艱鉅的挑戰。布希在一九九〇年十月對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即提到，從二次戰後以來，聯合國現在最具有真正成為國際集體安全中心的機會。<sup>⑬</sup>就如同美國需要藉助聯合國以維護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定，聯合國也最需要美國的支持。

3. 經濟問題在後冷戰時代更為各國所重視，國際性及區域性的經貿組織在世界經濟中愈顯重要。包括俄羅斯及中共在內的主要國家均面臨調適市場經濟的挑戰，特別是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改革，造成大量的失業工人及過度的通貨膨脹，是俄羅斯經濟上的一大危機。另外，從德國與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可能性的探討，即可看出經貿實力在後冷戰時代國際權力架構所可能扮演的角色，易言之，未來德日兩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將與其在經濟上展現的實力相當。

冷戰時代亟待解決的諸多國際問題，例如：核子武器的擴散、在冷戰時代受到壓制的民族主義，及由於武力競賽而遭忽視的經濟發展等，並未隨冷戰的結束而消失。由於經濟事務逐漸在國際關係上占有更重要的份量，也引發新現實主義重視經濟問題而受到重視。但是，新現實主義並未完全脫離傳統現實主義強調安全的思路。<sup>⑭</sup>

#### 四、結 論

現實主義者對國際組織擔負維持和平的功能，一向持懷疑的態度，而過去四十年間，聯合國在這方面的成就也終究有限。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的加強雖是一種趨勢，而美國的態度是決定聯合國執行這項任務可發揮其功能到何種程度的主要因素，而非攸關美國國家利益時，美國是否也會給予全力支持，則可視為現實主義因素在美國外交政策內影響力的一項指標。

美國若欲聯合國發揮安定世局的功能，則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勢必仍須以大國為主要對象，如俄羅斯、日本、德國、中共、歐體、印度等，有人主張，可將目前的七國高峰經濟會議，擴大為包括俄羅斯與中共在內的九國高峰會議，並以討論

註⑬ *Ibid.*, p. 413.

註⑭ 有關新現實主義的論點及其批判，參見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非經濟性的議題為主。<sup>⑮</sup>理想主義者信持之國際組織功能會被強調，但其功能的彰顯却有賴現實主義者所主張之權力運用及外交上的縱橫捭闔。

現實主義著重的是事實，它探討國際政治的實際面而非應然面，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雖不乏傾向理想主義的主張，如倡導人權、民主等，這些自可做為美國所追求的長程國家利益，但忽視現實政治所加諸推行這些政策的約束，却可能導致美國消耗有限的國家資源。卡特政府時十字軍東征似的在全世界倡導人權與民主政治，因之而引發伊朗及中南美一些國家的變局，甚至引爆仇美、反美的運動，應可為柯林頓政府在外交政策推行時的殷鑒。

新世界秩序的形成會是一個國際政經權力再分配的過程，美國位居此一近似單極國際體系獨強的後冷戰時代，自有其領導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條件，但是新的世界秩序能否符合美國的期望，則端賴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所能動員的能力而定。至於政治制度及文化傳統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其他大國如俄羅斯、中共，甚至印度會否在影響新世界秩序的議題上，與美國產生共識，則是另一值得探討的問題。而非針對敵國的集體權力平衡，在後冷戰時代並非完全不可能。<sup>⑯</sup>

美國仍是世界的超級強國，對於世界的和平與安定，自有做為一個超強不可避免的影響力與責任，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雖傾向於理想主義的主張，但美國的利益是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國際事務的影響。或許在新世界秩序未底定之前，在無強國對抗下的國際安定，對美國而言，就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目前，美國無強敵環伺，美國朝野普遍認為經濟復甦重於一切，在此環境下，政治現實主義提供的不只是研究美國外交一項較具連貫性的理論途徑，同時應也是觀察世局的一項警惕。而如何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尋求一平衡點，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而言，應也是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挑戰。

\*  
⑮ Hobart Rowen, "A G—(More Than) 7 Should Satisfy These Outside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30~31, 1993, p. 6.

⑯ 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於一九九三年一月訪問印度時，即敦促亞洲的大國聯合起來以平衡美國與歐洲的利益。參見 Molly Moore, "Yeltsin, in New Delhi, Urges Realignment of Asia's Largest Nati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30~31, 1993, p. 2.